

清代

文献学简论



叶树声
许有才
著



QINGDAI WENXIANXUE JIANLUN

安徽大学出版社

本书受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清代文献学简论

叶树声 著
许有才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文献学简论 / 叶树声等著. -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 1

ISBN 7-81052-795-9/K·58

I. 清… II. 叶… III. 古文献学 - 中国 - 清代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7170 号

清代文献学简论

叶树声 许有才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印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58 发行部 0551-5108397	开本	850×1168 1/32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印张	8
责任编辑	王先斌	字数	210 千
封面设计	孟献辉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795-9/K·58

定价 14.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论清儒整理图书	(3)
第二章 校勘学	(20)
论清儒校书	(22)
王念孙父子校书特点概说	(40)
谈卢文弨校书	(49)
顾广圻校书、刻书谈	(55)
论孙诒让校书	(62)
一条引文断句说	(66)
第三章 辑佚学	(70)
论清儒辑佚	(71)
山东清儒辑佚概说	(85)
马国翰窃章宗源辑佚成果辨	(91)
第四章 辨伪学	(97)
论清儒辨伪	(98)
梁启超对辨伪学的贡献	(112)
论姚际恒辨伪	(129)
第五章 目录学	(135)
论清儒编目	(137)

清代目录数量·····	(149)
论章学诚对目录学的贡献·····	(153)
论维新派对目录学的贡献·····	(171)
黄虞稷及其著《千顷堂书目》·····	(178)
《读书敏求记》及其著者钱曾·····	(185)
第六章 分类学 ·····	(188)
论清儒分类·····	(189)
《西学书目表》对分类的突破及其影响·····	(200)
第七章 编辑学 ·····	(204)
论清儒编书·····	(205)
安徽清儒编印丛书概说·····	(220)
第八章 翻译学 ·····	(225)
论清儒译书·····	(226)
近代中日两国译进西书比较研究·····	(245)

第一章 总 论

我国清代的学者们做了大量整理文献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整理成果,丰富和发展了清代的文献学理论,清代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目录学、分类学、编辑学、翻译学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研究总结清儒在整理文献时所做的具体工作及其对清代文献学发展的促进,对于我们今天整理文献和发展当代文献学不无帮助。

清儒整理文献时所做的具体工作主要有:校勘、辑佚、辨伪、编目、分类、编书、译书等。这些工作的广泛深入开展,促进了所属学科的理论发展。为了使读者对这些方面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对清儒所做的这些工作及其对所属学科理论发展的促进按其不同类型分章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我们首先介绍清儒校书工作及其对校勘学发展的促进。因为该项工作贯串于其他整理工作之中,各项整理工作都离不开它。其余几项整理工作之间虽有一定关系,但不密切,多是平行的,所以可以按上述顺序分别进行介绍。其中如果有哪两种关系密切,则将其放在一起先后进行介绍。如编目与分类关系密切,前者对后者有重要促进作用,我们就分章先论说前者,后论说后者。

在分章论述清儒所做的某项具体整理工作时,一般都是先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然后再对在做该项工作中成绩突出者有选择地进行分别论述。在分述时,若某地区突出,就单述该地区,如山东清儒辑佚等;若某团体突出,就单述该团体,如维新派对目录学的贡献等;若某些人突出,就选有代表性的进行单述,如王念孙父子校书、姚际恒辨伪等;若某项整理成果突出,就单述该成果,如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黄虞稷编的《千顷堂书目》等。有的工作及其学科成绩突出者不止一位,我们只能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一

位或几位进行单独介绍。

另外,与清儒整理文献有关的学术界存在的值得商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有选择地提几个出来进行讨论。比如,关于马国翰窃章宗源辑佚成果的问题,关于清代目录数量的问题,关于如何对段玉裁关于古书致误之因的一段话进行断句的问题等,我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清儒整理图书

在我国清代,学者整理图书之风大兴,所投入的人力之多,所做的工作之多,所整理出的图书之多,皆为其以前各代所不及。清儒整理图书的结果,一是为后人留下众多可读的书,二是使大量文献免遭亡佚,三是为后人整理文献提供了方法和经验,四是促进了清代文献学的繁荣和发展。其意义颇为深远。

一、清儒整理图书的背景

在清代前期,社会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略显繁荣,学者治学之风甚浓。清政府为了长治久安,也需汉人参政。他们同明代一样,也兴教办学,并通过科举选材入仕。诸生渴望通过读书跻身于仕林,所以诵读热情甚高。广大社民当物质生活稍有好转,便要求提高文化生活质量。他们多喜读文艺书籍。这一切说明当时社会用书量很大。

但是,由于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乱,以及当局的有意销毁,很多文献亡佚,学者治学和教育用书有很多无处可见。在现存的图书中,由于明人喜刻书而略于校讎、清政府的有意抽改和一些整理图书者的凭意妄改,很多书脱衍误倒现象严重,实不堪读:“有断烂而部不完,有删削而篇不完,有节抄而文不完,有脱误而字不同,有增补而书不同,有校勘而本不同。”^①不少书“所言是非得失,皆与事实大相径庭,是不惟厚诬古人,抑且贻误后学”。^②学子若读误书,必将被其所误;学者若据误书治学,得出的结论也多有误。这比不读和没有这样的结论还要有害。若让其流传,危害更大。另外,清代私人藏书盛行,藏书中也不可有伪有误,否则为人耻笑。鉴于这

① ② 罗孟楨.中国古代目录学简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194、194.

些情况,清儒们意识到,为了保存文献,为了便于诸生读书,为了帮助学者治学,就要搜残存佚,刊布流行;对于误书、伪书、残书和佚书,要通过考辨、校补和辑佚,正本清源,恢复其原貌。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存文献免遭亡佚,并使大家有书可读,而且还不致被伪书所骗和误书所误。要做到这一切,就要大力整理图书。

另外,当时有些汉儒看到反清无力,复明无望,又不愿为清政府效力,加之文字狱阴云笼罩,他们怕招惹是非,便不问时政,整天埋头于故纸堆里,借以消磨时光。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图书整理工作。

其次,清政府为了粉饰太平,笼络人心,消除汉人的反满情绪,由政府出面,广招诸儒,编《古今图书集成》,修《四库全书》,纂《明史·艺文志》,大征天下书,进行整理和编修。这对当时清儒整理图书有着某些有利影响。

二、清儒做的整理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清儒做了大量整理图书的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在叙述清儒具体整理图书时一并论及)。归纳起来,清儒所做的整理图书工作主要有八个方面。

(一)校讎

校讎的主要任务是删衍、补脱、纠谬、订讹、理乱。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书中篇章,二是文中字句。其主要目的在于恢复古书原貌和为诸生读书。要达此目的,便需要一定的方法。清儒当时所用之法甚多,主要从以下诸方面入手。

1. 文字。清儒从文字入手校书,主要是从字形、字音、字义、字声、古字、讳字、怪字、常错字、假借字几方面辨误纠谬。如《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不以为奢侈也,故节于身,谓于民。”王念孙《读书杂志·晏子》校之曰:“‘谓’当为‘调’,形相似而误也……《盐铁论·遵道篇》曰:‘法令调于民,而器械便于民。’文义与此相似。”在

1972年山东省银雀山出土的汉墓竹简中,该书此处正作“调”。王氏主要是从字形入手校出此误的。

2. 词汇。在这方面,清儒多从词义、词类、修辞、古人用词特点等校书识误。如《逸周书·文酌》:“发滞以正民。”王念孙《读书杂志》校之曰:“‘正’疑当作‘匡’……‘匡民’,谓‘救民’也……本书中言匡者多矣。”王氏主要是从词义校正此误的。

3. 音韵。有些古书很重押韵,在这样的书中,该押韵而未押韵者,就可能有误。这也是清儒校书的着眼点。如《国语·晋语三》:“威兮怀兮,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猗兮违兮,心之哀兮,岁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黄丕烈《校刊明道本国语札记》曰:“‘徵’当依别本作‘微’。此以威、怀、归、猗、违、哀、微、依、妃为韵。”

4. 句法。句法内容很广,清儒主要是从句型、句读、对句、叠句、逻辑、句子字数、上下句关系等方面辨误纠谬。如《列子·仲尼篇》:“孤犊未尝有母,非孤犊也。”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校之曰:“‘有母’下当更迭‘有母’二字。本云:孤犊未尝有母,有母,非孤犊也。”俞氏是从叠句和逻辑两方面校正此误的。

5. 文法。在文法方面,清儒主要是从文义、上下文势、行文特点三方面识误纠谬。如《逸周书·文傳解》:“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与马非其有也。”王念孙《读书杂志·逸周书》校之曰:“此下有‘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十五字,而今本脱之。上文云:‘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是专指有国者而言,故此引夏箴以明家国一理之意。若无此十五字,则但言家,而不及国,与上文不合矣……《玉海》三十一所引皆有此十五字。”

6. 引文。古书相互引证者多有,这也可作校书之着眼点,清儒也时用之。如《逸周书·作雒》:“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王念孙《读书杂志·逸周书》校之曰:“卢曰:‘以为土封,一本作以土

封之。’念孙案：一本是也。以土封之，谓各以一方之土封之，故下句云：‘受列土于周室也。’若云‘以为土封’，则文意不明。《北堂书钞·礼部上》、《太平御览·地部二》……《玉海》九十九并引作‘以土封之’。”

7. 礼俗。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礼仪、称谓、习俗等也就有别。清儒也以这些为着眼点进行校书。如《颜氏家训·风操》：“昔侯霸之子孙，称其祖父曰家公。”卢文弨《颜氏家训集解》校之曰：“此‘孙’字、‘祖’字或误衍。”卢校为是，古习惯称家公为父，所以“孙”、“祖”二字为衍。

8. 史料。一书所载史料与史实出入较大者，也多有误，清儒也从此入手校书。如《欧阳行周集》卷五：“列县出于千。”何焯校时，将“千”前加一“五”字。顾广圻指出，何加“五”不妥，因与史实出入较大，其《思适斋集》卷四校之曰：“行周此记，作于贞元十五年，已非复贞观、开元之盛，其绝不得反有五千县之多，明矣。”此校有理。据《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有县“一千五百”之余。

9. 人物。清儒有时也从人物生卒年月、姓名、字号、官职、爵里、爱好、主张等方面入手识误。如《左传·庄二十八年》：“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左传》校之曰：“东关为姓矣。既以东关为姓，则东关下愈不当有‘嬖’字。如梁五，以梁为姓，而谓之梁嬖五可乎？《汉书·古今人表》正作‘东关五’。”

10. 文物。文物因为古，所反映的史料大多可靠，清儒也用其校书。如《后汉书》卷六五引郑玄的话说：“吾家旧贫，不为父母昆弟所容。”阮元等不少学者校此书时都认为，“不”字为衍。因无证据，不敢妄断。后阮元亲往山东郑玄故乡考证文物，终在泥沙中发掘出金承安五年重刻的郑玄之墓碑，碑文是重刻唐万岁通天年间史承节撰的，文中此处无“不”字。阮元《小沧浪笔谈》卷四说：“不为父母兄弟所容，碑无‘不’字。”他言之有据，便成定论。

11. 版本。不同时代的版本其特点不同,所用字词多能体现时代特点。这也是清儒校书的着眼点。如某古本《汉书·地理志》:“扬州藪、扬州川、扬州山。”王念孙《读书杂志》校之曰:“凡‘扬州’字,古皆从‘木’,不从‘手’……至明监本,则全书皆作‘扬’矣……今书传中‘杨’字,皆改从‘手’旁。”他指出,扬州之“扬”字,明监本及其以后从“手”为是,以前从“木”为是。

12. 利用他人校勘意见。古书流传至清,有不少为历代诸儒所校过。其中的正确者,清儒则加以利用。如《诗·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校之曰:“疑经‘休息’之字作‘休思’也。”阮元认为孔校为是,直接利用之。其《十三经注疏》校之曰:“《正义》之说是也,此为字之误。”

除此之外,清儒还从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数量单位、事件时间先后、所校书的注文、古书致误原因等方面着手校书。总之,他们所用的方法很多,这里所举实不全面。

归纳清儒所用之法,不外三大类型:死校法、活校法、综合法。

1. 死校法。清叶德辉《藏书十约·校勘》曰:“死校者,据此本校彼本。”即同书不同本相校,又叫对校法。此法简单,易于发现错误,但要纠正之,尚需他法配合,或辅以佐证。如从音韵入手校书例,正是用对校发现“别本作微”,又用其书的押韵特点而校改的。

2. 活校法。叶德辉《藏书十约·校勘》曰:“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此论并不全面,仅适用于活校法中的他校法。除他校法外,还有本校法、理校法。这三种校法与对校法一起,在校勘界被通称为校书四法。

①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此书,又称外证法或旁证法。如从文字入手校书例就属于此法。

②本校法。即以本书校本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该法是:“专从本书各篇所用的语法、文字注意,或细观一段中前后文义,以意逆志,发见出今本讹误之点。”有人称其为本证法或内

证法。如上面从词汇入手校书例就属于本校法。

③理校法。即以理相校。此法又称为理证法,主要是从文章义理、行文体例、用词特点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治,分析推理,得出结论。如上面从句法入手校书,用的就是理校法。

3.综合法。即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校法。如上面从人物入手校书,就同时使用了本校、他校二法;从文法入手校书,同时使用了对校、本校、理校三法;从引文入手校书,则四种校法同时用上:“一本作”属对校,“下句云”属本校,“文义不明”属理校,“并引作”属他校。

清儒校书方法科学,校勘成果甚为显著:卢文弨校书二百三十余种,顾广圻校书二百来种,孙诒让校书近一百种。王念孙父子、戴震、俞樾、毛扆、黄丕烈、钱大昕、鲍廷博、王鸣盛、段玉裁等也都校了一些书。他们校的书多,订正书中的讹误更多。如惠栋校《礼记》,正讹四千七百零四字,补脱一千一百四十五字,删衍九百七十一字。

(二)辑佚

在整理文献诸项工作中,辑佚实为重要。有了文献,才有整理对象。辑佚有两大任务——辑佚书和佚文,有两个要求——完备和真实,有两个途径——域内和域外。清代辑佚工作开展得较为普遍,并逐渐形成辑佚学。张舜徽说:清儒辑佚,“用的方法比较过去精密多了。于是辑佚便成为当时学术界中心工作之一,取得的成果也特别显著”。^①归纳一下,清儒辑佚方法主要有五个方面:

1.从类书中辑佚。因为类书汇集了群书,当其单书亡佚,类书中的还在。清儒修《四库全书》,仅从《永乐大典》中就辑佚书三百七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

2.从汉人子史和笺注中辑周秦书。清儒使用的汉人之史和笺

^①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195.

注主要有《史记》、《论衡》、《韦昭国语注》等。

3. 从唐人义疏中辑汉魏书或文章。如清儒从《周易集解》辑汉诸家易注等。

4. 从史注和总集中辑佚文。清儒所用史注多为六朝唐人之著,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等;所用文集,如《文苑英华》等。

5. 从《经典释文》和有关音义书中辑小学书。清儒用的音义书有慧琳的《音义》等。

清儒辑佚的方法和途径还有一些,如从文选、金石刻、传注中辑佚文资料。以地区而言,他们辑佚远涉域外。如湖州鲍廷博父子编刻的《知不足斋丛书》,内收佚书新辑本多种,其中《孝经郑注》、《五行大义》二书就是从日本辑来的。

清儒集体辑佚成绩突出者,除上述修《四库全书》辑佚书外,在编《全唐文》和《全金诗》时也辑了大量佚文。个人辑佚成绩突出者有:马国翰辑佚书五百八十余种,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丛书》中。王谟辑佚书四百余种,收入《汉魏遗书钞》中。黄奭、严可均、章宗源、李调元、张金吾、黄以周、丁杰等人也都辑了一些佚书和佚文。

(三)辨伪

古书流传至清,由于有人做手脚和辗转流传,伪书情况严重。张之洞《輶轩语》说:“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此说似嫌夸张,但当时伪书确实不少。清儒要整理图书,就要辨伪。辨伪的根本任务有二:一是某书是否真为所题作者所著,有否托古;二是某书是否符合其初印原貌,其篇章内容有无参改。清儒所采用的主要辨伪方法是:

1. 查考书目法。一般著作,历代书目多有收录,不见收录者多伪;虽被某书目收录,但久佚后偶又出现者,其中有的可能为伪。

2. 检阅引用或评论法。一书问世,或被他人评论,或被他人引用;该书也会引用或评论他书。此书若不见被其后之书引用或评论,则多伪;此书引用或评论之书确系其后出者,则十有九伪。

3. 人物鉴别法。书中所论及的人物晚于其书著者的,则多伪。

4. 史料考证法。经考证,书中所载史料与事实相差甚远者,或出于作者之后者,则多伪。两书同载一史料,但完全矛盾者,其中之一多伪。

5. 两本对比法。某书甲本为世人公认的真本,乙本与甲本在篇章或内容方面有较大差异,乙本或本子为伪,或有的篇章为伪,或有的内容为伪。

6. 版本识别法。不同时代出的书,其文例、字体、刀法、讳字、纸墨、装帧、款式等多有不同。若某时代出的书,其版本特点与同时期其他书差别较大,则可能为伪。

另外,还可结合审视书之藏章、题跋、牌记、有无剗改和蓄意熏制之迹,既可辨出伪书,又可判定版本。

清儒辨伪主要用这些方法。其次,他们也有从书的流传入手、从各时代社会特点入手等来识别伪书的。

清儒辨伪成绩突出者主要有:姚际恒辨伪书八十八种,皆收入其著《古今伪书考》。他还辨出一些伪文和一些书中部分内容为伪。清儒修《四库全书》时,辨出伪书二十七种,怀疑为伪者十一种。梁启超《饮冰室专集》收其辨出的汉以前书全伪者二十四种,部分伪者六种,怀疑全伪者八种,怀疑部分伪者八种,同时指出或作者误或时代误的书十九种。阎若璩、孙志祖、惠栋、刘逢禄等人也辨出一些伪书。对于清儒辨伪工作,梁启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清儒经三百年多少人研究讨论的结果,已经解决的十之三四,尚未解决的十之六七。但解决问题,固然是学术上一种成绩;提出问题,也算一种成绩。清儒在这部分所做的工作也算可观了。”^①

(四) 编书

这里仅指编制丛书。这也是一项重要的整理图书工作。清儒

^①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北京:中国书店,1985:261.

在整理图书时发现,编制丛书好处颇多,既有利于保存文献,也有利于诸生求读。清季编印丛书之风盛行,所修丛书质量之高、内容之博、体例之完、数量之多,皆其前代所未有。据阳海清《简述十七种清代自著丛书的渊源流变》一文报道,清季仅自著丛书一类,其总数将近千种。来新夏认为:“清代前期的丛书总量在八百种左右,占全部现存丛书的四分之一强,而其编纂质量远胜前代,至于品种繁多更为历代所不及。”^①由此可知,清儒编辑丛书近千种。

清代官修丛书主要有《四库全书》、《律历渊源》、《御纂七经》等。其中以《四库全书》最负盛名,它是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

私修丛书的品种与数量远超官修丛书。以收书内容分,有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如张海鹏的《学津讨源》就是有影响的综合性丛书。专科性丛书更多,几乎包括经学等所有学科,不再举例。以所收书的著者籍贯分,有全国性的和区域性的两大类,如刘承干的《吴兴丛书》等,为郡邑丛书。以丛书本身版本优劣分,大多是普通本,也有不少校刻精良的善本丛书,如蒋光煦的《别下斋丛书》等。以编者意图分,主要有校讎派、辑佚派、版本派三种,不再举例。也有一些丛书同时具备几个特征。如鲍廷博父子的《知不足斋丛书》,既是综合性丛书,又是校讎丛书,还是辑佚丛书和善本丛书。

(五)编目

上面已说,清儒在整理图书时要做校讎、辑佚、辨伪等工作。做这些工作都离不开目录,都要编目工作来配合。这是因为,目录能为清儒整理图书带来方便:

1. 可以使图书整理者避免重复劳动,节约时间,多出成果。有目录指导,清儒整理图书时就可以知道,清时古书已有哪些为佚,

^①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图书事业,社会科学战线,1986,(3)。

在这些佚书中,已有哪些被人辑出,各辑出了哪些内容,免得辑者非佚,或辑者已有辑本,白费功夫。目录还可以告诉清儒,古书中哪些为伪,伪在哪里,哪些书或书中哪些地方被怀疑为伪,根据是什么;在这些伪书中,哪些已被辨清楚,无需再辨,哪些尚未被辨明,需要辨之。同样道理,有目录指导,清儒做校勘、诠释、考据等整理图书工作时,皆可避免重复劳动。

2. 可以告诉图书整理者整理图书时所需要的资料,以及如何求到它们。清儒在做校勘、辑佚等各项整理图书工作时,都需要一定的参考资料,否则无法进行。有目录指导,就可以大体上知道,在做某项整理图书工作时,都有哪些资料可参考使用,这些资料都藏在何处,如何寻到它们。

3. 可以告诉图书整理者书的版本优劣异同与内容好坏差别。一书有时有几种版本,校书也好,辨伪也好,都要从一书诸本中择出一佳本为底本,参考本书他本或他书进行校讎或辨伪等工作。目录能告诉学者:某书有几种本子,何本为优,优在哪里;何本为劣,劣在何处;某书各本都是谁校谁注或谁刻;它们之间内容有何差别。所以有目录指引,清儒整理图书选择版本时就可选到足本、真本、善本。

除此之外,清儒做编目工作,还有以下几种原因:

1. 清代藏书事业的繁盛。在清代,古籍约有 15 万种左右。其中绝大多数藏在私人手中,所以清代私人藏书家数以千计。其中家藏达十万卷者,也不乏其人。藏书事业的大发展,必定能促进编目工作的开展,而且藏书家越多,编制的目录也就越多。这是因为:①收书需要目录。要收集图书,就要知道行世的书有哪些,其中自己缺哪些。清黄丕烈《季沧苇藏书目跋》云:“藏书不可无目,且书目不可不详载何代之刻、何时之钞。”有这样的目录作参考,收书时就可做到不重、不漏、不误。②管理需要目录。图书收集多了,将其合理地排在架上,才能方便使用和管理。清儒认为,应编